

01123

論農民問題

陳伯達著

生活·讀書·新知

聯合發行所

論 農 民 問 題

陳 伯 達 著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聯 合 發 行 所 發 行

農 民 問 題

著 者
發 行 者

陳 伯 達

基 本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 版 期
印 刷 者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滬 初 版

科 學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中 正 中 路 五 三 七 號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目次

第一章 問題的提法

農民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問題	一
只有工農聯盟農民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	二
第二國際的政黨忽視農民問題	四

第二章 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農民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作用	六
在西歐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六
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農民	七

第三章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農民……………一二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俄國布爾塞維克在農民問題上的基本口號……………一三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農民

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俄國布爾塞維克對於中農的政策……………一六

農村經濟的集體化……………一八

斯大林憲法與集體農民……………二二

第五章 中國的農民土地問題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土地問題……………二五

附 錄

中國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特權·····	二六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農村·····	二七
太平天國與農民土地問題·····	二八
辛亥革命與農民土地問題·····	二九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農民土地問題·····	三〇
中國蘇維埃運動與農民土地問題·····	三一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與農民·····	三三
土地改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何幹之）·····	三六

第一章 問題的提法

農民問題
是工人階
級的同盟
軍問題

關於農民問題，本來是工人階級鬥爭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工人階級要順利地、勝利地進行自己的鬥爭，需要自己的同盟軍，而農民則恰是可以做工人階級最好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如沒有與農民聯合，是很不容易成就自己的解放事業的，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對於德國曾有過這樣的熱望：『在德國，一切事情都要看能否再來一次農民戰爭以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為轉移』。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重視，在事實上完全證明是對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便是沒有農民鬥爭的配合，沒有及時得到農民的幫助。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候，需要爭取農民為自己的同盟軍，為的是使這個革命貫徹到底，使農民可以完全從封建的（或加上民族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並把

農民由資產階級の後備軍（像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變為無產階級の後備軍，而形成工農的聯盟（如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時候）。馬克思在德國資產階級性革命還未完成的時候，就是曾這樣集中無產階級策略方面的極大注意力，去發展農民的民主毅力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的問題，帶着極端重大的意義。這時，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而在這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繼續具體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工農同盟的原則，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更把這問題加以具體規定和處理的，就是列寧和斯大林。

只有工農
聯盟農民

無產階級為着自己的解放，需要與農民同盟，同時農民如果沒有與無產階級同盟，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勝利，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歷史上

才能得到
最後的解
放

許多農民戰爭，他們起來反抗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是因為沒有城市工人階級的幫助和領導，都最後陷於失敗了，西歐一些國家內的農

民，曾在資產階級性革命時，與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封建制度，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解脫封建的剝削，可是却又轉陷入於資本主義的剝削。這樣，農民也還是沒有得到真正的最後的解放。農民要得到真正最後的解放，不至於一方面解脫了封建剝削的痛苦，另一方面又陷於資本主義剝削的痛苦，只有和工人階級同盟，才是可能的。

無產階級為自己的解放而奮鬥，同時也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在這樣的目標上就擺着工農同盟的問題，我們需要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無產階級應該去盡量發揮和利用農民所擁有的革命毅力和革命可能性，以便利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助長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同時這也就是為着達到全人類的解放，為着使得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達到自己真正最後的解放。

第二國際
的政黨忽
視農民問
題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這首先是因爲，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諷刺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爲是文禮家風的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都沒有，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的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時，我們正不難明白地了解了：那忠心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堅決爲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的世界革命導師列寧和斯大林，爲什麼在每個時機都那樣無情的斥責第二國際對於農民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打擊孟塞維

克和託洛茨基派反對工農同盟的反革命理論。

第二章 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農民在資
產階級
性革命
中的作用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成爲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當社會經濟的發展已達到帶着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趨向的時候，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和城市中的反對封建的運動密切地聯結起來，而爆發爲革命，農民在這革命中所要求的，就是要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獲得在經濟上自由發展的機會，爲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正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候所說的：「……在現時歷史階段上，農民是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業進化的代表。」

在西歐資
產階級性

在歷史上，各國農民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機遇並不是一樣的。在法國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還幼稚，沒有成爲

革命中的
農民

獨立的政治力量，革命的領導權屬於資產階級，農民和資產階級在一起反對封建制度，而得到了勝利；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不是從當時人數尙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因此，當時在那裏，農民是成爲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的結果使得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資
產階級性
民主革命
中的農民

可是，在俄國資產階級性革命中，情形却就兩樣了。當時俄國是處在另一種歷史的條件下，是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

「一，革命前夜，俄國工業的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

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最偉大的力量。

「二，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的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三，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的傭僕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的懷抱，而且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四，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的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五，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它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的鬥爭合爲整個革命的巨流。

「六，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斯大林）

俄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不是革命的動力，而是成爲反革命的力
量，農民要從中世紀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必要追隨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起；同
時，這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正是像列寧所說的，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列寧
指出了農民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形式之一，並認定它的最後勝利爲『工農革命民主的專
政』。列寧對於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完全直截了當地認爲『只有工農聯盟才能保
證革命的勝利』。列寧寫道：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
者對於現在的農民運動，應抱怎樣態度呢？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努力地幫助農
民，最徹底幫助農民把官僚政權和地主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
道，只推翻官僚和地主政權還是不夠。推翻這個政權以後，同時又應準備去消滅資本的

政權，資產階級的政權……」。（「列寧選集」五卷中文版一五七——一五八頁）

在這革命中，以列寧、斯大林爲首的布爾塞維克的戰略上口號便是：與全體農民一致反對君主與地主，孤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

反對列寧、斯大林主張的託洛斯基，站在孟塞維克一樣的立場，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託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主張無產階級應該拋棄農民，跳過農民革命；而提出「不要沙皇，政府是工人的」的口號，以反對列寧、斯大林關於「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託洛斯基主張的實質，是在於孤立無產階級，切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有利於沙皇和地主，並幫助了資產階級，而要使革命流產。

事實證明了列寧、斯大林主張的正確。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沒有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無產階級成了農民革命的首領，因此，農民成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資產階級却失掉了農民，失掉了基本的後備軍，因

此，革命的結果，和西歐資產階級性革命恰相反，資產階級沒有增強自己的政治力量，反而是削弱了。而無產階級却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如大家所知道的，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以及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的樹立領導權，結果就成了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

第三章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農民

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實行工農聯盟，這就是在於把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變成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無產階級獲得這個偉大的後備軍，就易於使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俄國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十月社會主義蘇維埃革命的過程，所以易於完成，就是因為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有了工農聯盟，大多數農民是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而在二月革命後，農民更深切地認清了追隨無產階級是解放自己唯一的道路。

二月革命後，當時俄國農民渴望停止戰爭和得到土地，但克倫斯基政府——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的聯合政府却主張繼續戰爭，拒絕沒收地主土地。十月革命的偉大領導

者之一——斯大林關於這時期的農民，這樣描寫道：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也是得不到土地，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夠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的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的正確，催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
俄國布爾塞
維克在農民
問題上的某

在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中，實現了布爾塞維克的戰略上的口號：工人和貧農的專政。在準備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民問題上的基本口號，就是：「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和鄉村內的

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當資產階級還未被推翻，以及資產階級已被推翻，而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是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因此，就只好使它中立起來。當中農已經相信：資產階級已「真正」被推翻，蘇維埃政權正在鞏固起來，富農正在被克服下去，紅軍已開始在國內的戰線上節節勝利的時候，它便開始轉向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反對列寧、斯大林主張的託洛斯基，在這時候反對中立中農的政策，主張反對中農的政策。託洛斯基的主張，是企圖把中農推到反革命方面去，以危害革命。然而十月革命畢竟按照列寧、斯大林的政策而取得勝利了。

十月革命的「附帶」產物，便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性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是由十月革命才澈底完成的，正是因此，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得到全體農民的同情。二月革命沒有澈底完成俄國資產階級性革命的任務，而把這任務移交於十月革命，造成了

十月革命勝利更好的條件，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這對於社會主義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但這絕對不是說：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性民主底命。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沒收資本家的產業。這裏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直接的社會主義任務與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之相互的錯綜。」

「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偉大的成績之一，就是它澈底的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掃清了中世紀的一切污物，這對於鄉村有非常重要的、能左右一切的意思。不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使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就已經說過（在第一章上，我們已引過了馬克思的話——編者）。不做到這一層，無產階級革命也就不能鞏固起來……。」（斯大林：「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口號」）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農民

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俄國布爾塞維克對於中農的政策

當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鞏固的時候，中農轉向於無產階級方面來，這時候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布爾塞維克黨，是採取與中農妥協的政策——聯合中農的政策，即改變中立中農的政策為同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無產階級依靠貧農，聯合中農，一分鐘也不停止與富農鬥爭，為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這樣的工農聯盟，則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是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革命把農民從地主、資本家、高利貸者、富農、商人和投機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就造成了農民可能與無產階級進行經濟合作的極順利的條件，造成了農民可能追隨無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極順利的條件，同時也就是造成了無產階級幫助農

民改造自己經濟、消滅一切剝削、實現幸福的集體生活的先決條件。

俄國無產階級在鞏固自己政權後，布爾塞維克「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是要漸漸地、有計劃地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中去。黨的任務，是要把他們與富農分裂開來，仔細地關心到他們的需要，以思想上論說服方法的方法去消滅他們的落後，漸漸地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切不可採用壓制的手段，凡是關聯到他們切身利益的地方，都必須與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社會主義的改造之實行的方法時，必須向他們讓步。」（聯共第八次大會記錄）

託洛斯基對於這無產階級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頑強地反對。託洛斯基否認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勞動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的理論，而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權與廣大農民羣衆有一敵對的衝突，認為蘇聯內部沒有力量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從而得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然而，託洛斯基這個反動改革

命的「理論」，結果是被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所粉碎了，並被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光輝偉大的勝利所粉碎了。

另一方面，則有布哈林關於聯合富農的主張，關於反對對富農進行鬥爭的主張。這主張是在於放任資本主義的發展，企圖使蘇聯回復到資本主義去。布哈林這主張與託洛斯基主義，在實質上都是否認社會主義的建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東西的兩種表現，是反革命主張的異曲同工。然而，布哈林這個反動反革命的主張，結果也同樣地是被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所粉碎了，並被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光輝偉大的勝利所粉碎了。

農村經濟的集體化

所謂對農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就是要由極小的個體的農業改造為大規模的公共的農業，由小農莊聯合成爲大的集體農莊。經過什麼道路來實現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呢？『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的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

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的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的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的生產方面』（斯大林）就是說，首先經過供給的和銷售的合作，然後進到生產的合作。這種生產的合作制之基本的形式，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大規模具體發展起來的集體農莊。斯大林對於這種合作制的發展過程，這樣描寫道：

「在還沒有大規模的集體農莊運動時，合作制的低等形式，如供給的和銷售的合作制，曾是一條「康莊大道」。而在合作制的高等形式和其集體農莊的形式登上了舞台時，那末，後面這種形式，就成了發展中的「康莊大道」。」

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怎樣去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這樣康莊大道呢？就是需要給予物質的幫助和財政的幫助，本來恩格斯早已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爲了農民的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担負些物質犧牲……這樣担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

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十月革命後，列寧在具體論蘇聯農業發展的道路的時候，他這樣指出：『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現在我們應該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蘇維埃政府，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用農村借貸和機器去幫助集體農莊。蘇維埃政府，為貧農和中農農業上的改造，建立了農學的和機器的大批應用場所，組織了機器站，給了貧農和中農以早期的借貸，減少了農民三倍的稅務，對於貧農完全免除了稅務。這一切，就形成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工農堅固的聯合。

蘇聯農業集體運動普遍的發展，這是在一九二九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這是偉大轉變的一年。中農參加到集體農莊來了，富農則進行兇殘的反抗。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運動猛烈地發展了起來，聯邦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口

號，在農村中，由限制、排擠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為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依靠這樣的工農聯合，蘇聯農村經濟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變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機械化的、用新的技術武裝起來生產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國家。蘇聯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在斯大林的兩個五年計劃的年代中完成了。在這個短短的歷史時期中，創造了二十四萬三千七百個集體農莊，五千以上的蘇維埃農莊，五千八百十九個農業機器電引機站。在集體農莊內，聯合了全體農村中百分之九十三的農民經濟。在全國總耕種面積上，社會主義部門的比重佔着百分之九九·一。聯邦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在斯大林領導下，運用了和發展了列寧關於工農聯合的政策，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改造了農業，終於攻下了蘇聯國內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了。富農是被消滅了。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體農莊的發展，已經把貧農生活提高到中農的水平錢了。爲

着把農民的生活更往前推進一步，斯大林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的大會上，提出了「應當使全體集體農民都成爲富裕的」的口號。

集體農莊的收入增加着，集體化勞動生產力提高着。集體農民的富裕生活，文化的和快活的生活，天天在發展着。集體農莊的實際生活告訴了農民：集體農莊是爭取富裕、文化和快樂生活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可是，這並不是說，農民隨便能夠走上集體農莊的道路。要走上集體農莊的道路，正如斯大林在第一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的大會上所說的：「首先必須完成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與地主，沒收他們的工廠和土地，建立新的工業。」

斯大林憲

法與

集體農民

現在蘇聯的農民已不是普通的農民，而是嶄新的農民，是成爲社會主義的自覺勞動者。斯大林在蘇聯第八次蘇維埃臨時大會上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著名報告中，論到蘇聯的農民的時候這樣說到：

「我們蘇維埃的農民是完全嶄新的農民。我們已經沒有剝削農民的地主、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了。因此，我們的農民是擺脫了剝削的農民。而且，我們蘇維埃農民的最大多數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即是他們自己的工作^一和財產，不依靠個人勞動和落後技術，而是依靠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最後，我們農民的經濟基礎，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集體所有制。由此可見，蘇維埃農民，這完全是嶄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的。」

最近蘇聯實行新憲法（斯大林憲法）以後，集體農民在選舉上已與工人完全平等，享受一樣的權利了。在那裏，工人與農民之間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今後在那裏的任務，是要繼續消滅城市與鄉村的矛盾，消滅智力與體力的矛盾；在進行和完成這任務面前，集體農民與工人，將攜手並進於共產主義最高的階段，而在那裏的旗幟，將寫着的是：「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第五章 中國的農民土地問題

中國歷史
上的農民
土地問題

數千年中，中國社會歷史鬥爭的基本社會內容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在每個朝代中，所爆發的農民戰爭以及在士大夫中關於所謂「限田」、「恢復「井田」、「均田」和「計口授田」等問題的不斷被提起，就是或者爲的要求解決這問題，或者爲的企圖和緩這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對於農民土地的兼併是很可怕的。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成了歷代一種反覆的規律。地主的土地，有的竟達數十萬畝，所謂「田連郡縣」(宋代朱勳之家，田至三十萬畝，這就是一個著名的大地主)。至如，歷代皇朝掠奪農民田地來賞賜皇親國戚的，其土地的數目尤可驚人。比如，明代神宗所賜福王的田地，竟至二百萬畝，連延數十郡。在歷史上，「一邑之中，

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清康熙時一個地主剝削的極端代表者邱家穗語），「有田者只十分之一，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清康熙時一個同情於農民者盛楓語）。這是一種平常的事情。一般說來，如認為有一千畝田地的便算是大地主，那末，在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佔田一千畝以上乃至數萬畝以上的大地主，這種數目是很不少的，而且在社會上實佔統治的地位。大地主是各朝代的真實統治者。這種狀況，經過清代，直到現代，大體上還是沒有多大變更的，雖則各地方個別的情形不完全一樣。

中國地主
階級在農
村中的特
權

地主在農村中大都具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權，所謂「挺厥特強，視細民爲魚肉」，「武斷鄉曲」，「格殺莊佃」，這種事實_{在歷史上}不斷地被記載着。國家的法律，如「大清律例」的「鄉飲酒禮」且公開規定：「佃戶見田主，不論齒鉞，並行以小事長之禮。」如有違反，則鞭

農民的收入除了用一半以上交給地主以外，還要供給政府的賦稅及供給地主和政府的各種徭役。所以，「今日完租、明日乞貸」（顧炎武語），就成了農民經常的生活，而到一定時機，就時常迫得農民最後要去「賣妻鬻子」或「典賣田宅」。但另一方面，許多地主的收入却時常是富比王侯的。

歷代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削，實造成了中國民族的落後及其歷史發展的停滯。歷代農民戰爭雖會不斷地給地主以打擊，但因為沒有城市可靠的同盟軍和堅強的領導者，却最後陷於失敗，不能對於土地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歷代士大夫（最大部份是由地主出身的，是地主的工具）所提起的如「限田」諸問題，大抵是有鑒於農民的反抗和統治者自己的危機而發的，辦法大都近於空想，而且在實際上還是被地主所拒絕的。

帝國主義

侵入

近代帝國主義者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後，不但在城市中進行壟斷各種新式的企業，從中操縱中國經濟的命脈，而且也把他們的勢力深入農

中國農村

村，從各方面參加對於農民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剝削。他們進行使地主從屬於自己，進行把地主變成自己的工具，同時，在許多地方並使自己也成爲地主。他們在農村中，用直接間接的各種方式：做高利貸的事業，經管盜掠式的商業交換，去剝削農民，使農民或直接或間接地陷入他們剝削的鐵桶中，並使農民加緊地、不斷地破產和失掉自己的土地。這種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地主、軍閥、官僚的封建剝削結合起來，農民的遭遇是更加惡化了，更加慘苦了，而農民的土地問題也更加迫切的要求解決了。

太平天國 與農民 土地問題

太平天國戰爭是百年來中國農民要求解決自己土地問題的第一幕。這一幕雖然也因為當時沒有城市革命階級的領導而陷於失敗，但這戰爭和過去歷代許多農民戰爭比較起來，是具有較明確的土地綱領，較明確的民主要求，是農民戰爭與民族戰爭的結合，這表示中國農民是進步

了，是已在接近着解決自己問題的門戶了。

辛亥革命

與農民

土地問題

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孫中山先生爲吸引廣大農民羣衆來參加，提出了一「平均地權」的原則。在實質上，這原則的提出，也正是反映了農民關於土地要求問題的存在。然而農民在辛亥革命中並沒有得到土地。辛亥革命並沒有由反滿的革命發展到農民土地革命。當時「平均地權」的提出，還只在抽象的原理方面，關於解決的辦法，則還限於「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同盟會宣言〕按照這樣的辦法，是還沒有直接明白規定農民的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同時，就是上述的辦法，也是受到反對的。在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到處演說，希望實現上述的辦法，都沒有得到效果，許多上層的黨人都完全拒絕中山先生這種辦法。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沒有在實際上繼續發展聯合農民的政策，在關於農

民土地問題的態度上，完全可以看得出來。這是表現了當時黨人與袁世凱妥協的基礎，同時也是表現了辛亥革命失敗的基礎。

第一次國
共合作與
農民土地
問題

農民土地問題的重新被提起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即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和根本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自己的職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孫中山先生也熱情地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把「平均地權」原則重新列在宣言、

政綱上面，在宣言上並且宣稱：「……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隨後孫中山先生在農運講習所講演，並進而承認「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大革命中廣大農民革命運動開始興起的時候，一九二六年十月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規定了：「減輕農佃佃租百分之二十五」。然而因為地主的拒絕，這種「二五減租」，在國民革命勢力下，並沒有立即得到實現；同時，因為農民革命的發展，農民已

急切地要求解決土地問題，「二五減租」，在當時事實上也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

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廣東、兩湖農民的土要求，日益急切。武漢政府時代，兩湖有些地方的農民已開始在田地插標，自動地實行「耕者有其田」。關於國民革命的完成，有賴於全國農民之興起，這本來已是國共兩黨所共同承認的，而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已益使每個革命政黨對於這問題需要提出具體的答覆。當時大多數中共黨人是主張農民無代價地得到土地的，但因為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這主張沒有得到明確的決定。當時，漢國民黨中央為處理這問題，特設一個土地委員會，在原則上規定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決，這在事實上也就是沒有解決問題。

中國蘇維埃運動與農民土地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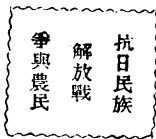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擴大會議，正式決定土地革命的主張。同年廣州起義就鮮明地提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中共六次大會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舉行的。這次大會根據了大革命的經驗，

正式地決定了土地綱領，沒收地主土地，耕地歸農民。

一九三〇年新興的革命高潮——蘇維埃革命運動，在許多省區，實現了真正「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中國工農蘇維埃運動實行了沒收地主、軍閥、豪紳、高利貸者和一切外國教堂的土地，無代價地分給貧農、中農、佃農、苦力和紅軍戰士。這樣，使得許多省區千百萬農民都覺醒起來，興奮了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熱忱。土地革命運動的發展，日益明顯地表現出自己反帝的性質，農民大眾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起來鬥爭，去反對帝國主義者。

蘇維埃革命運動對於土地的分配是側重於貧農、佃農、中農的利益，分配的原則大體上曾採取了勞動力與人口混合的原則（就是說，斟酌每家農民人口與勞動力多寡的情形而定），分配時候，並注意土地面積大小與該地質量好壞。關於分配的原則在實際中的具體應用，事實上時常要看農民的自願，比如，有些地方的農民，願意根據勞動力多

少來分配，也有些地方的農民，願意根據人口多少來分配，蘇維埃根據他們的自願，才去進行具體的分配。



自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之後，土地革命是停止了。爲着各黨派的合作，以便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來抵抗民族窮兇極惡的大敵——日本帝國主義者，土地革命政策的停止是必要的。不過爲着動員最廣大的農民大衆起來參加抗戰，以求達到民族最後的勝利，關於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如何改良農民生活，則仍是抗日的各黨派所要重大關心的問題。農民在我國佔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我們民族任何偉大的事業，不求得農民的合作是很困難有所作爲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朝廷的成功，無疑地是因有農民的參加和幫助；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勝利，不論在廣東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之役和北伐之役，農民都盡了很大的幫助，都貢獻了很大的功勞，這是有目共見，衆所共認的。九一八以後，東北各地義

勇軍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日戰爭，其中的成份，最大部份就是由農民組成的。抗日的偉大戰爭發動以來，全國各地戰綫上的漫山遍野的游擊隊，最大部份是由我們的農家父子弟諸姊妹所結成的。從這一切事實看來，我們已可以看到，農民在我國民族革命事業上具有何等偉大的作用，同時，也正足以證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部的實際是農民問題，……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斯大林）。可是我們必須承認：在抗戰前面，我們對於農民的動員還是很大地不夠。農民在生活上被剝削的負擔和牽制，使得農民不能自由地動員自己，這是一個最重大的遺憾。所以，實行民主立憲的政治制度，改善農民生活，在今天恰是從抗戰上着眼被提出來的。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原則，大家必須實現合理的負擔，才能展開各方面的動員。出力的農民是該受有錢者的克己優待的。我們知道：日寇所到，是「玉石俱焚」的，是讓日寇來到弄得玉石俱焚呢？還是更廣大地

動員農民，以便驅逐日寇，使得我民族可過獨立、自由、幸福的生活呢？這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在這時候減少廣大農民羣衆的捐稅負擔，堅決地反對貪污（這種貪污大部份都直接間接落在農民身上），實行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中國國民黨所提出過的減租制度，減少農民借款利息，實是改良農民生活和更廣大地動員農民大眾來參加抗戰應有的步驟。

至關於農民的土土地根本問題，當然，爲着民族解放的澈底保障，爲着民族在經濟上的廣大自由發展，爲着使中國可以由落後的進爲近代文明之邦，這個問題是要求歷史能在一定的時間內給予適當的解決的。

附錄

何幹之

土地改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的中心內容，是實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後，使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耕者有其田，原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偉大理想，中國已經過的歷史，並沒有使農民得着解放，農民要求解放的運動，充滿着中國歷史的內容，農民戰爭是要求得着土地。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問題必須澈底加以解決，這是毫無疑義的事。關於土地改革和農民解放在歷史上的作用，毛澤東有極深刻的分析：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

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第一節有歷史性的規定，說明了土地改革的兩個根本問題。第一，束縛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土地）的分離，如果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那麼，農產收穫除了交付土地稅之外，都是農民的所得，而農民也自然而然地逐漸富裕起來，並且有餘力改良其農具，增高其生產力，發展農業中資本主義了。第二，農業生產發展之後，一部份農民逐漸脫離農業，即工業人口逐漸增加，農業人口逐漸減少，因而提供了勞動力的市場，而同時，農民大量供給工業原料，大量吸收工業產品，又擴大了工業的商品市場。這個過程的形成，也即是國內市場的形成。國內市場的形成，就是勞動力和工業商品市場的形成。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毛澤東有極明確的解說：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

爲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中國近幾十年來工業畸形發展的結果，在沿江沿海一帶，也形成若干商業的城市，但人口有一百萬以上的城市，也不過只有五六個。如果有了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那麼，大的城市，還要有十倍以上的發展，而小城市的發展要有平衡性，根據經濟條件的需要，合理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大的城市以外，更要有無數中小城市。近代工廠是大規模的組織。抗戰期間，桂湘粵三省所有工廠、包括內遷新創以及原有者在內，共計有三九七個單位，職工人數共有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五人，僅僅及於美國福特公司一家四分之三、動力全數共有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馬力，也僅僅及於印度泰泰鋼鐵廠一家所發電力三分之一。中國大工廠的創設，有待於抗戰後的大規模的審計。然而要建設近代城市和近代大工廠，在勞動力方面，必須轉移鄉村人口爲城市人口。但是小農經營使勞力被束縛於細小農場之上。中國農家每戶人口數一般都在五口左右，五口左右

的農家所經營的農場面積也只在二十畝左右，這樣多的人口，經營這樣小的農場，實在是極不合算和極不經濟，這是封建土地關係下所必有的結果。如果廢除了這種關係，實行集體勞動，從此更進一步改良農具，使用機器，則不能耕種的土地，可以變成能耕種的土地，生產能力薄弱的耕地，可以變成爲生產能力豐富的土地，原來需要十人耕種的土地，可以變成只用五人或一人耕種的土地，農場既可以擴大，人力既可以節約，農村的過剩勞動力，自然也可以投奔於城市工業上去了。

關於工業市場這一點，毛澤東又寫着極扼要的話：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的市場，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原料，與吸收最廣大的工業品。」

農業是工業的市場，這個命題，含有三種意義，一是農村供給城市糧食，二是農村供給城市原料，三是農村吸收城市的工業品。農村既然供給幾千萬非農業人口的糧食，

那麼在農業本身也必須是大農的經營，用少數勞動力來耕種廣大的農場。至於原料問題，其意義更爲重大。新式工業爲本身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所規定，是集中、大量的、標準化的生產。和此相適應的，工業原料也必須是集中的大規模的標準化的。但是細小的分散的農家經濟，決不能達到這個地步。小農經濟的生產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是每一區域或每一農家都並行種植着各種原料產品的，品質是多種多樣的，所以必須改變了小農的經營方式，才能够適應着大工業的需要。

關於工業的市場，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從兩方面創造了市場：第一，富足的農民擴大消費的結果，創造了消費品的市場；第二，農業的擴大生產需要生產工具，創造了生產工具的消費市場。依翁文灝的估計，全國農產總值約有三百餘萬萬元，如果增用化學肥料，興修新式水利灌溉和改良種子，用這些科學方法，產量至少可以增加一倍，即達到六百餘萬萬元。固然，不先改革土地制度，只求技術上的改良，農業生產力斷然是

不會提高的。但如果將來社會條件與技術條件並行改革之後，農產價值增加了一倍，那麼消費品和生產工具市場的擴大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以上所說，是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的道路。但是，在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爲了在全國範圍內與國民黨團結抗日，在解放區內使農民與地主團結抗日，把土地革命的政策改爲減租政策。這個政策在抗戰勝利之後依然在解放區以最大的廣度和深度實行起來。抗戰期間土地政策，依中共中央所規定，這個政策有三個重要步驟，這三個步驟，概括的說，一是減租減息，二是交租交息，三是獎勵富農。這三個步驟實行起來，是提供了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業生產力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極有利的條件。第一，減租減息，依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決定裏所規定是『提高農業生產的必要的前提』。必須首先有了這個前提。這個前提具備之後，人民的政府就必須用最大的力量來發展農民經濟。在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二年底，毛澤東總結經濟問題，提出新任務的時候，他以增開荒地，推

廣植棉，不違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實行累進稅等七項政策，爲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主要條件。實行了這些政策，就有陝甘寧這幾年農業生產的大進步、大發展。第二，交租交息。毛澤東解釋交租交息的政治和經濟的意義說：『爲着團結一切社會階層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適當地交租交息，獎勵地主的資本向工業方面轉移。』關於這一點，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保障了地主的地權與交租交息，但既已實行了減租減息，主佃雙方的合理要求都得到解決，而地主靠着地權的收高，就不如以前那麼豐厚了，這樣就使地主資本逐漸向着工商業方面轉移，即是使收租地主變爲經營地主。用資本主義方式去經營土地或開辦工廠，是一種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第三，富農的生產方式，除了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質的剝削以外，是帶有資本主義性的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總之這三個步驟實行之後，無論從農民經濟來看也好，從地主經濟來看也好，從富農經濟來看也好，都有利於生產力的提

高，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減租減息政策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一是初步的改革，一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期的澈底的革命，兩者是有着原則上的不同的。然而在中國現時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兩者却又有連帶的關係，是可以由初步的改革達到澈底的革命。「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抗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行減租減息，然後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這樣看起來，減租減息是達到解決土地問題的第一步，有了這個初步的改革，戰後在政治改革的條件下是可以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以上是根據毛澤東關於民主主義革命整個時期的土地政策，以及抗戰期間的土地政策，從理論上加以研究；以下更從這個政策實施之後所發生的結果，加以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拿陝甘寧邊區為例。我們以陝甘寧為代表，不僅僅由於陝甘寧是解放區的第一位，是中共中央政策直接領導下的地區，也不僅僅由於陝甘寧在抗戰期間未受着戰爭的

直接影響，向來都在相對和平狀態之下。最重要的一點，是這裏有兩個地區：分配土地區與未分配土地區，即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都有所形成的地區，並且這兩種地區的大小，也不相上下。在土地面積上，未分配土地區佔百分之四十，人口則佔百分之五十。在經過土地分配的地區，封建關係已經被廢除，中農貧農在農民中佔絕大多數的人口。一九四二年西北中央局考察團在綏德米脂一帶調查的結果，關於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的土地所有關係，在綏德延安川，中農貧農在人口方面佔百分之九六·五，富農佔百分之二·六，其他只佔百分之〇·九。在土地分配上，中貧農佔百分之九三·五，富農佔百分之四，其他百分之二·五。綏德義合鎮沒有富農，在人口和土地這兩方面，貧農中農佔百分之一百。既然沒有地主，也沒有或很少新富農，人口的最大多數是中農和貧農，而中農和富裕中農所佔的比例又最大，以這樣的階級關係為基礎，陝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趨勢究竟怎樣，這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延安農村調查團一九四二年所作關於八個自然村的調查，解答了這個問題。這八個自然村原是在神府縣直屬鄉。作者們從勞動力、土地、牲畜、羊、租佃、僱傭、典地、賣地、借貸各方面，系統地分析了構成土地分配後農村中兩大階層中農與貧農的發展趨勢。雖則只是八個村的材料，但可以代表整個已經分配土地區的實際狀況。爲使大家明白這個農村經濟的特點，我把調查的結果撮要寫在下面。

(一)八個村中的兩大階層是中農與貧農，中農佔各村戶口總數的百分之四五·七，貧農佔四一·八，合起來共佔八七·五。

(二)在人口、勞動力、土地、牲畜、肥料的分配上，中農與貧農之間是不平均的，這種不平均使他們在生產力方面，也發生着差別。中農，尤其是富裕中農，因爲土地耕的好，肥料上的足，每垧地的生產是比較高，是代表農村中較高生產力的一個階層。據調查，富裕中農每垧地的產量，一九四一年至少在四斗半至五斗之間，一般中農

在四斗至四斗半之間，而貧農只不過三斗半。

(三) 也由於同一原因，中農是農村中的主要力量。以後農村經濟的發展，將是中農經濟的繼續發展，一部分貧農將上升為中農，中農將變為富裕中農，或前進為富農。

(四) 在勞動力、土地、牲畜等分配上，中農與貧農的差別，說來並不很大，不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差別，而只是同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差別，所以在已經平均分配的土地上，只要誰有足够的勞動力，再加上一兩條牛或驢，誰就可以由貧農上升為中農。

(五) 在農村經濟的繼續發展中，必然產生着使用僱工的富農與被僱用的農業工人。這八個村子的二九九戶中，只有一家富農，但富裕中農，已有三十八戶，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感覺着土地不足和資本過剩，他們正在利用一切方法，如租田、典地、借牛，增加其財富，並且從僱用短工發展到僱用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長工。貧農方面的另一部分，又感着有地而無法耕種之苦，開始典出租出與賣出所分配的土地，甚

至爲了生活上的急需，荒着土地去做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長工。從這兩方面的發展上，將發展着農村資本主義，發展新式的農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六)土地革命後的生產關係，有利於獨立小生產者發展其生產力，因而農村分化的過程，很是遲緩，所以充分發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力，正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至於未分配土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則又走着另一條不同的路。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經濟的確有了新的發展。據米脂張家茆的調查材料，貧農由一九四〇年至四三年間，購進土地三十四垧，而一九四三年購入最多，達二三垧，約佔百分之七十。綏德延家岔村十二家地主有一七〇一·五垧地，但在一九四〇年至四四年間，典賣土地共有六一九·五垧。佔土地總數百分之三六·四。所以一般的現象是農民典入與買入土地，地主則典出與賣出土地，而典進與買進土地最多的是貧農。這種現象，除了貧農生活逐漸

上升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中農沒有租入土地，在不准地主不合理的調動租戶的原則下，在賣地先讓與租戶的原則下，中農實在無地可買。這雖然只是一部分材料的報告，但從此值得注意的，一方面是貧農生計的逐步上升，另一方面是地主的轉化。減租的地主，生活標準固然比一般農民還好些，但靠着收租過活，還不如另外尋找其他更好的出路，因此有些地主開始改業，有的從事富農經濟，有的改收租地主為經營地主，有的則改營工商業，由地主變為商人或工業家了。這是一種傾向，一種初步的傾向，然而却又

是進步的傾向。

這兩種傾向，或是貧農的上升，或是地主的轉化，都有利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從這條路繼續發展下去，將使農村形成着新的階級關係。

減租政策，原是國民黨所頒佈的二五減租。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博士所寫『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文內，說中國共產黨『今日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就是國民

黨自己要做的事，他們所努力建立的制度，也就是最接近於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民主制度。他們在今日不過要求農業改革，增進農業生產的能力，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馬氏的批評，的確是最平恕的話。但有一點，馬博士未曾指摘出來，就是國民黨頒佈了「二五減租的法令，而自己却不實行。國民黨內當權的反動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固然在反對，連減租政策也在反對，所以毛澤東用一句極深刻的話，總括了這種現象：『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既已反對任何農業改革，那麼他們所得的結果，就是馬寅初博士所指的『增進農業生產的能力，提高農民生活的水準』的反面了。我們試引證抗戰期間四川省農作物生產指數。四川省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心區，而四川又不是抗日的戰場，這樣一個地區，歷年農作物的產量却是每况愈下的。四川的作物分夏冬兩季，夏季作物以水稻、紅苕、甘蔗為最大宗，冬季作物以小麥大麥為最大宗，根據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編製的材料，七年間農作

物的產量如下：

	二七年	二八年	二九年	三〇年	三一年	三二年	三三年
秈稻	一三三·五七二	一三三·七九	六〇·七二八	七七·六二四	八三·七六三	七八·二七三	九五·四六六
紅苕	七六一〇三	五二·〇八	四六·三四二	五八·九五七	四七·三一九	四七·三四八	五二·七三四
甘蔗	四一·二五八	一七·二〇六	二二·四三三	一四·二二五	九·二八八	一一·五四三	一五·〇〇四
小麥	三七·七三四	二六·〇五六	二二·六八四	三三·一三二	二二·七五八	二五·一九一	二六·三六八
大麥	一九·六三三	一三·四〇九	一〇·四九五	九·八七八	一一·九五二	一〇·四八三	一一·八三二

其實不需要任何的註解，數字的本身，已經是最好的證據了。無論那一種作物，三十三年比較二十七年，都大量減退。最大的一種作物秈稻，歷年，呈着減退的現象，尤其在二十九年，減少了一半以上。以後幾年，雖則有些微的增加，但以三十三年而論，比較二十七年，僅及於百分之七十。減少最烈的是甘蔗，幾乎少了三倍。這毫無疑義是

國民黨採用着限價統購統銷等政策而得的惡果。

四川省農業生產力的衰退，表示出國民黨農業政策的破壞性和退步性。毛澤東說得好：『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其對於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國民黨的政策，破壞了農業生產力，這點證明了這個政策有根本改革的必要，要不然，依舊執拗地繼續下去，將為全國人民所反抗，那是勢所必至的了。